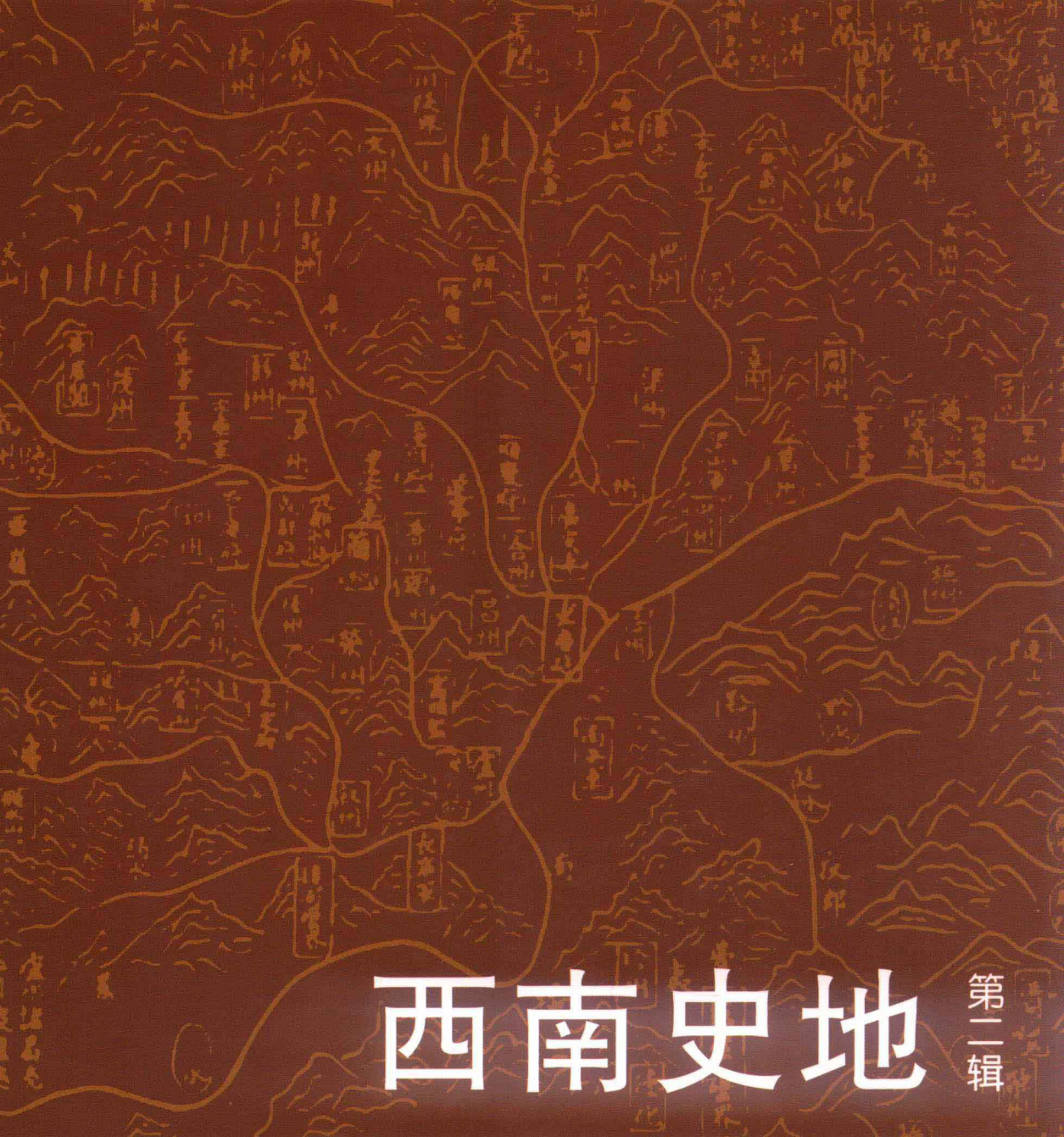




西南史地

第二辑

重庆市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编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西南史地

第二辑

重庆市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编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南史地·第二辑 / 重庆市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 — 成都: 巴蜀书社, 2013.5

ISBN 978-7-5531-0225-2

I. 西… II. ①重…②西… III. 历史地理—西南地区—期刊 IV. ①K9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7575号

XINAN SHIDI DIERJI

西南史地·第二辑

重庆市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编

- 责任编辑 谭晓红
封面设计 经典记忆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网 址 <http://www.bsbook.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四川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260mm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460千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1-0225-2
定 价 60.00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科联系。

《西南史地》编委会

编 委（按姓氏拼音为序）：

段 渝 蓝 勇 李勇先

林超民 林文勋 陆 韧

马 强 史继忠 杨光华

张新民 朱圣钟

主 编：蓝 勇

编辑部主任：朱圣钟

Contents
目录

学术论坛

- 巴国迁都阆中考 蒋晓春 余小洪 / 002
- 巴郡政区沿革史述论
- 兼论郡名流变与巴人的关系 朱圣钟 / 010
- 蜀汉刘备脱险地石门山位置考 杨 华 孙 凡 / 029
- 吴、晋、唐初及宋代兴山县治考证 孙 琳 马 剑 / 034
- 再论唐代西南地区荔枝分布北界
- 与聂顺新高榷 周运中 / 038
- 元明清时期麓川地区行政区划变迁及相关地名考论 杨长玉 / 042
- 河湖水患与明代云南若干政区治所的迁徙 陈庆江 / 057
- 明清时期滇池海口水利与人地关系
- 以河中滩变迁为中心 刘灵坪 杨伟兵 / 065
- 前清巴蜀土地资源的获取方式与利用进程 龚义龙 / 074
- 重庆民族地区历代作家地理分布与原因探析 ... 彭福荣 张媛媛 / 091

硕博论坛

- 宋代夔州路砦堡地理考 裴洞毫 / 104
- 明代长江三峡乡镇里地理考 韩 平 / 235

区县论坛

- 汉晋卑水县治考 邓 沛 / 324
扑朔迷离的故道与陈仓道 郭荣章 / 328

书评

- 华夏边缘之于西南“族类”
——读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
的制度、开发与认同》 李 鹏 / 336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一）

学术论坛 XUESHULUNTAN

巴国迁都阆中考

蒋晓春 余小洪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南充 637009)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成都 610064)

对巴史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华阳国志·巴志》中的一段话：“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1]对于这段文献，学术界并未深究，往往简单地理解为巴国为楚所逼，不得不多次迁都，最终定都阆中。如童恩正先生指出：“巴国的都城由丰都、涪陵、重庆、合川、而至阆中的不断迁徙，也就是楚不断进迫的结果。”^[2]笔者认为，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因为楚国进逼只能导致巴国向西退避，而不能很好地解释巴国为何在迁都时忽东忽西，并且最终落户阆中而不是其他地方。除此以外，迁都阆中的时间、路线等问题也有待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巴国迁都阆中的相关史实进行初步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巴国迁都阆中前的形势

(一) 巴楚关系

为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本文观点，下面简略梳理巴楚关系的脉络。

公元前611年，楚联巴、秦灭庸^[3]，巴分得鱼邑（今重庆奉节一带）。此后巴楚和睦，互为姻亲。

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围鄢……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遽固败巴师于鄢”^[4]。自此巴无力与楚抗衡，不得不将统治中心西移。

公元前377年（楚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5]。关于

[1]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2]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页。

[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文公十六年），中华书局，1995年，第617页。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十六年），中华书局，1995年，第1713页。

[5] [汉]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720页。

蜀伐楚之事,学术界颇多争议,一般理解为蜀、楚之间有巴,当是巴、蜀联兵伐楚^[1]。赵炳清则认为此时巴楚关系和睦,所谓蜀伐楚即蜀伐巴,因蜀国的军事行动威胁到楚国安全,楚挥兵反击,在兹方打败蜀军,重新夺回盐水,并在盐水附近筑关设防^[2]。联系到另一条相关文献:“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3]赵炳清认为,正是蜀伐巴,导致巴请师于楚。对此笔者表示赞同,同时笔者认为,之所以把蜀伐巴记为蜀伐楚,一是当时巴国实力衰微,依附于楚国;二是蜀越过孱弱的巴国后,兵锋继续前指,直至千里之外的兹方,达到了楚国腹地,以至于主要战事是与楚国进行的。

此次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是巴,不仅遭到蜀国的讨伐,事后还可能因巴蔓子诳楚而遭到楚国的报复。虽然文献对报复之事没有明确记载,但考古发现提供了线索。忠县崖脚战国中期楚墓的发现证实楚军曾占据忠县一带,远远超过了此前楚国的西界^[4]。

《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5]而张守节《正义》云: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巴郡也”。不论是理解为“巴的黔中”还是“巴和黔中”,都已表明此时楚已占据大片本属于巴国的领土。上述忠县半边街楚墓等一系列考古材料都表明楚国的势力已经达到巴国腹地忠县一带^[6]。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甚至可能覆盖了渠江流域,因为渠江中游地区的广安曾有“楚城”的别称。如唐代诗人崔涂在游览了广安肖溪镇的冲相寺后写下《春游冲相寺》一诗:“水流花谢本无情,道尽东风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青催满镜生。自是欲归归不得,五湖烟景有谁争。”^[7]而在渠江流域流传的春申君故里传说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8]。由此可见,在公元前361年左右,楚国已经占据了从汉中以南至忠县、云阳、涪陵等地了,实际上已经截断巴国从小江(彭溪河)向西撤退至嘉陵江流域的路。

(二) 巴蜀关系

史籍中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关系记载不多,学术界的研究也较少,但文献中还是有

[1] 持此种看法的学者较多,如童恩正就说:“按照我们的意见,由于春秋后期蜀的统治者已经是巴族,那么在某些情况下两国采取联合行动,是完全可能的。”(见氏著《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页。)管维良说:“因巴蜀上层人物同族,且蜀国强于巴国,故太史公略巴而只书蜀。”(见氏著《巴族史》,天地出版社,1996年,第58页。)

[2] 赵炳清:《略论巴蔓子》,李禹阶主编《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329-338页。

[3]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4]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重庆市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崖脚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第729页。

[5] [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02页。

[6] 白九江:《从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看楚文化的西进》,《江汉考古》2006年第1期。

[7] 崔涂:《渠州冲相寺》,《全蜀艺文志》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 彭邦本:《荆楚文化西渐与川东春申君故里传说》,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2011年10月。

一些踪迹可寻。

《华阳国志》在提到巴与苴好、蜀怒而伐苴时,《巴志》说“巴蜀世战争”^[1],《蜀志》相应记为“巴与蜀仇”^[2]。可见巴蜀两国积怨甚深。以理揆之,当时各国之间的深仇大恨不外乎争夺领土之事。巴蜀领土之争在文献中也有一些线索。

《华阳国志·蜀志》:“后有王曰杜宇……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3]其中的“七国”,学界多认为有误,任乃强指出乃“巴国”之误,甚是,否则就无法理解此句。其中的潜水,有指为渠江者,但渠江距其他三条水太远(均川西一带),于情于理皆不合。任乃强认为是广元东北嘉陵江的一条支流。并说“广元,汉葭萌县地,在周秦世与汉中皆属蜀,故常氏举之”。杜宇之后,卢帝曾“攻秦至雍”^[4],“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5]。周显王之世即公元前368-前321年。由此可见,从广元以迄汉中曾长期是蜀国的势力范围。

在长江流域,蜀伐巴至兹方的事实说明,蜀是沿长江一线向东进攻的。换言之,蜀的军事实力已达距离江州不远的长江沿线。

广元以南、长江以北的巴蜀分界线在文献中也有线索。《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六引李膺《益州记》:“昔巴、蜀争界,久而不决。汉高帝八年,一朝密雾,石为之裂,今犹如之。自上及下,破处直若引绳焉,于是州界始判。”“青石山在合州西二百四十里”^[6],大致在蓬溪县境内^[7],已在涪江之东。文献所记巴蜀争界的事虽然发生在西汉初年,但这个分界的结果既然是巴和蜀都能接受的,也就意味着多年以来巴蜀之界大体就在此处。由此可见,巴蜀的界线大体从广元至绵阳沿涪江以下至遂宁一带,因涪江在合川注入嘉陵江,故蜀国的南界应靠近合川和江州。这就意味着,蜀国的东界相当靠近巴国,实际上已将巴国向西迁徙之路堵死。

由此可见,在蜀、楚两国的夹击下,巴国的统治范围已大为缩小,仅仅保留了以江州为中心的长江一线,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随时可能被蜀和楚占据。巴国为自保和收复失地曾东奔西突,先是退避江州,然后是垫江,后又东突到平都,皆因实力不济难以久长。

《华阳国志》所记的忽东忽西的迁都历史正是当时巴国在夹缝中生存形势的真实体现。面对咄咄逼人的蜀、楚两国,最后的拓疆努力已宣告失败,为保存力量,唯一的出路在于逃离两国势力之间的夹缝,另寻安身立命之所。

[1]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2]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3]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

[4]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2页。

[5]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6] [明]李贤、彭时等:《明一统志》卷六九,中国基本古籍库,第2254页。

[7] 邓少琴:《梁李膺〈益州记〉辑存》,《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下),巴蜀书社,2001年,第590页。

东、西两面均已被敌国控制，巴国要迁徙唯有在南、北两个方向选择。江州以南为地势崎岖、交通不便、人生地不熟的蛮荒之地。江州以北有嘉陵江，沿大江大河迁徙是巴国的传统，而且巴国曾一度迁都嘉陵江边的垫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因此就当时形势而言，巴国沿嘉陵江北上是最好的选择。

如前所述，在公元前377年，蜀可以轻松伐巴至楚，而前361年楚又占据了巴的大片国土。可见在这16年间，巴国的处境多么尴尬，巴国迁都阆中的时间就应当在此之间。孙华先生认为在公元前362年^[1]，可备一说。

二、阆中之于巴的吸引力

巴国之所以迁都阆中，除躲避楚、蜀两国夹击之外，也还有阆中自身的一些因素对巴国而言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一）优越的战略位置

阆中虽偏居川北，但水陆交通便利，进可攻、退可守，自古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2]。其北有秦岭、大巴山形成天然屏障阻挡北方强国的入侵（主要指秦），甚至可以逆嘉陵江而上威胁秦、楚。向东过渠江、翻越华蓥山重新争夺三峡地区。向南可沿嘉陵江而下到达巴国故都垫江和江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阆中西面与蜀国疆域之间有大片空隙。根据多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嘉陵江以西至成都平原之间几乎没有春秋至战国中期的墓葬和遗址发现，一般都是汉代地层下直接叠压新石器时代地层或生土层，可见当时这一大片地区人烟稀少，甚至是无人区。故而定居于此的巴国不必担心世仇之敌蜀国的攻击。阆中以北的广元一带虽为蜀统治，但毕竟距离蜀的统治中心较远，蜀也难以据此对盘踞于阆中的巴国构成大的威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巴国迁都阆中的明智选择。蜀王封其弟于广元，本意是帮其镇守北方边境，但“苴侯私亲与巴”，为此惹恼蜀王，“蜀王伐苴，苴侯奔巴”^[3]。蜀王征伐的是苴侯，而不是巴，大概也有从蜀到巴（阆中）交通不便的原因。

就微观地形地貌而言，阆中本身也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处。它四面环山，三面环水，仅南面有一缺口与外界相通，便于军事防守。

[1] 孙华：《楚国灭巴考》，《贵州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

[2] 今人常用《舆地纪胜》、《方輿胜览》等古籍中的“前控六路之师，后据巴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来形容阆中的区位优势，但这显然是一个误解，联系原文上下文可知所指为汉中。

[3]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二) 丰富的自然资源

对于一个政权而言,迁都是大事,需要综合衡量各方面的因素。因此,除了政治、军事上的考虑外,自然资源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1. 渔猎资源

巴人长期生活在不宜农耕的峡江地区,维持生计主要靠渔猎和盐业生产。在湖北清江香炉石、秭归县朝天嘴和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商周时期的地层中都发现了鱼骨或捕鱼用的网坠等遗物^[1]。这些都是先秦时期峡江地区从事渔业的实物例证。

阆中地处嘉陵江畔,有“彭池大泽,名山灵台”^[2],具备渔猎经济所需的自然条件。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阆中土著秦精和胸忍人合制白竹弩射杀白虎之事就说明阆中猎人捕猎技巧高超,名声甚至可达数百里外的胸忍一带。

2. 盐业资源

关于巴人与盐业的关系,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一致:盐业是巴国的经济之源,立国之本,巴国一直在试图控制峡江地区的盐业资源,其迁徙、兴亡均与盐业资源的得失息息相关。任乃强先生说:“综合巴族历史兴衰、起灭之变,都是与巴东盐泉分不开的。”^[3]任老这句话大体不错,只是“巴东”这个限制词可以去掉。巴人与盐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盐巴之得名亦因巴人所产之盐^[4]。阆中一带同样拥有丰富的易于开采的盐业资源,这对于巴国而言无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这一点向为学界忽略,故需多费些笔墨论述。

四川盆地是盐矿富集地,南充地区也是一个大盐盆。“川中古隆起地区为刚性基底,其周边以深大断裂或超覆关系与相邻单元相接,作为一个完整的块体,它具有较其他地块大得多的稳定性。在这种区域性的相对平稳的构造背景下,川中地区在早中三叠世发生持续沉降,形成以南充为中心的碳酸盐台坪上最大的蒸发岩成盐盆地。”^[5]南充以北的阆中也位于这个大盐盆之内,而且是浅层盐矿^[6]。

虽然现在的文献材料中没有阆中在先秦时期开采盐矿的记载,但汉代这里已经有了大量盐井是无疑的。《华阳国志·巴志》:“南充国县,和帝时置,有盐井。”^[7]左思

[1] 孙华、曾宪龙:《尖底陶杯与花边陶釜——兼说峡江地区先秦时期的鱼盐业》,《中国盐业考古》第一辑,第310页。

[2]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3] 转引自白九江:《巴盐与盐巴——三峡古代盐业》,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4] 白九江:《巴盐与盐巴——三峡古代盐业》,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5] 马开义、姜枚、林传律:《川东北地区深浅层地质构造与盐盆分布关系的研究》,《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刊》1988年第1号。

[6] 马开义、姜枚、林传律:《川东北地区深浅层地质构造与盐盆分布关系的研究》,《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刊》1988年第1号。

[7]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蜀都赋》说蜀地“家有盐泉之井”，贾逵注曰“巴西充国县有盐井数十”^[1]。《太平御览》卷一六七引《益州记》载：“南充县西有大昆井，即古之盐井也”。按：充国县，西汉初置，献帝初平四年析置南充国县，原充国县即为西充国县。充国县秦时属阆中，治今阆中县西六十里的木兰乡^[2]。由此可见，在今天的阆中、南部一带的盐矿开采在汉代时即已十分兴盛，产量巨大。此后阆南盐场仍然风光十足。阆中地区“至唐时，已建有新井、新政两个盐区”^[3]。明嘉靖时，“盐课惟阆中、南部有之……南部设福兴等六井，盐课司二邑。阆中九井……南部一百一十井”^[4]。清代南阆盐场更是闻名川内外^[5]。“自乾隆二十四年以后陆续增开，现存盐井四十四眼……阆中县，盐井中井一眼，下下井七眼。南部县，盐井上井九眼，中井二十九眼，中下井一眼，下井一百四十九眼，下下井一眼。自乾隆元年以后陆续开造，又增井二百五十六眼。”^[6]由此可见，从汉至清嘉陵江流域的盐业生产活动一直较为繁荣。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先秦时期四川盆地没有盐业生产的文献记载，但不能据此认为当时没有盐业生产活动。峡江地区、川西地区（邛崃、蒲江等地）关于盐业生产的记载也是始于汉代，但是考古材料证明在先秦时期已有盐业生产活动。

根据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先秦时期的制盐器具有大口花边缸、尖底缸、尖底杯、船形杯、花边陶釜等。白九江认为“船形杯与尖底杯都是制作盐锭的器具，但两者制作盐锭时的受热方式不一样，可能代表当时两种技术途径。尖底杯是插在有较强余温的草木灰中（或置于填有草木灰的孔洞上）制盐锭，而船形杯是在盐灶上制作盐锭”^[7]。经检测：“中坝遗址西周时期花边陶釜内壁沉淀物和自贡汉代制盐遗址及云阳现代盐厂的沉淀物具有基本相同的物相，表明花边陶釜在当时是制盐工具。……结合考古发掘资料，推断这种花边陶釜应为当时的煮盐工具。”^[8]

包括阆中在内的嘉陵江中游地区已经出土了大量可能用于制盐的陶器。阆中城区的兰家坝遗址出土了尖底器、缸等陶器，南充市湍佛寺遗址有锯齿状花边陶缸、尖底器等陶器^[9]。原报告认为主要是新石器时期遗址，但据笔者研究认为，“主体应当是夏商周时

[1] [汉魏]贾逵：《文选注》卷四，中国基本古籍库。

[2] [晋]常璩著，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94-95页。

[3] 吴佩林、邓勇：《清代四川南部县井盐业概论——以〈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为中心的考察》，《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1期。

[4] [明]杨思震等纂修：《嘉靖重修保宁府志》，第160-161页。

[5] 四川南充盐业志编纂委员会：《南充盐业志·概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6] [清]黎学锦等纂修：《道光保宁府志》卷二一，第550-555页。

[7] 白九江：《尖底杯在古代制盐工艺流程中的功能研究》，《盐业史研究》2010年第2期。

[8] 朱继平、王昌燧等：《长江三峡早期井盐开发的初步探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第33卷4期。

[9] 重庆市博物馆：《四川嘉陵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3年第6期。

期”^[1]。阆中县坪上遗址商周文化层中“陶器多尖底……器形主要为尖底器，缸等”^[2]。阆中彭城坝遗址“发现了一批商周时期的陶器，特别是尖底和高柄陶器”^[3]。特别是宣汉罗家坝遗址1999年发现新石器晚期遗物中有花边口沿罐（缸）2件，东周时期M1有一花边圜底釜（M1：2，原报告称之为鼓腹罐），发掘者认为年代当在战国中期偏早阶段^[4]。罗家坝2003年发现花边折沿罐1件，以及少量尖底器^[5]。根据上述考古发现，考虑到当地盐业资源以及汉代以后盐业生产情况，我们有理由推测阆中一带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盐业生产。

（三）族群基础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国统治下的族群成分复杂，大致“有濮、賸、苴、共、奴、獯、夷、蜑之蛮”^[6]，其中今天的云阳一带土著为胸忍夷。

《华阳国志·巴志》中有一段胸忍夷射虎的精彩故事：“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黔、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于是胸忍夷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也记载了该故事，所不同的是《后汉书》明确指出射杀白虎的为阆中人：“时有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任乃强先生推测，是胸忍夷民廖仲、药何联合阆中秦精射虎^[7]。《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接着说：“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之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賸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可见板楯蛮到汉代时也称賸人。阆中亦有賸人，《华阳国志·巴志》说：“阆中有渝水，賸民多居水左右。”则阆中之民与胸忍之民同族，先秦称板楯蛮，汉世则称賸民。

胸忍一带盐泉众多，为巴国倚重之地，在云阳李家坝和开县余家坝发现的大规模巴国墓地可证此地曾为巴国统治。从胸忍溯小江而上，即达开县境内，翻过华蓥山就是渠江流域，因此胸忍与阆中距离并不遥远，路途也不甚艰险，两地土著族属相同并不奇怪。相同的族属为巴国迁都阆中提供了难得的族群基础。

[1] 蒋晓春、白九江、赵炳清：《川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初探》，《西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

[2] 孙智彬：《1989年四川主要考古发现概述》，《四川文物》1990年第2期。

[3] 陈卫东、周科华：《嘉陵江流域考古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22日。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1999年度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9年第4期。

[5]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9期。

[6]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页。

[7]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复原巴国迁都阆中的历史。公元前377-前361年间，在蜀、楚的夹击下，巴国已经十分衰弱，统治范围日渐缩小至江州一带。在多次拓疆无果的情况下，巴国看中了阆中的有利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以及土著族属，毅然选择逆嘉陵江而上并最终定都阆中。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当时唯一正确的决定。到阆中后，巴国通过修好与邻近的苴国关系而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得以苟延残喘数十年直至公元前316年最终为秦所灭。

巴郡政区沿革史述论

——兼论郡名流变与巴人的关系^[1]

朱圣钟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重庆 400715)

巴郡因巴人而得名,作为对巴地和巴人进行直接控制的行政区,巴郡政区的形成、分解到最后消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个变化过程,政区的变动、巴郡(州)名称的变化与居住于当地的巴人的变徙有一定的关系。

关于巴郡政区的历史变迁过程,邓子琴等《重庆简史和沿革》^[2]、董其祥《重庆地理沿革简志》^[3]、余楚修、管维良《重庆建置沿革》^[4]、蓝勇等编著《巴渝历史沿革》^[5]、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6]等论著从长时段角度对川东、重庆一带历史时期政区沿革情况进行过或详细或简略的梳理,但对巴郡政区的历史变迁及其与巴人的关系问题未作专门讨论。笔者拟对巴郡政区的演变过程进行探究,并对巴郡政区变动、巴郡名称变化与巴人关系问题进行尝试性讨论,借以求教于方家。

一、战国末期巴郡政区的形成

巴郡政区的设置大致应该在战国时期。具体到巴郡最早出现的时间,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类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巴郡的出现始于楚国占领巴地之时;一是认为巴郡出现于秦占领巴地之时。

认为巴郡出现于楚国占领巴地之时的,主要以张正明^[7]、杨光华^[8]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楚占领巴地之后,曾设置巴郡进行管理。在战国末期,随着楚国的西进,巴国东部部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代巴人分布迁徙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07BZS037。项目主持人:朱圣钟。

[2] 邓子琴等编著:《重庆简史和沿革》,重庆出版社,1982年。

[3] 董其祥:《重庆地理沿革简志》,《董其祥历史与考古文集》,重庆出版社,2005年。

[4] 余楚修、管维良主编:《重庆建置沿革》,重庆出版社,1998年。

[5] 蓝勇等编著:《巴渝历史沿革》,重庆出版社,2004年。

[6] 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7] 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05、315页。

[8] 杨光华:《楚国设置巴郡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4辑。

分疆域曾沦为楚国的领地，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不过关于楚对占领的巴地的管理，却并非只有设巴郡管理一种观点。其他观点还有：一是说楚分封巴人首领为王，派监管理，实行以巴治巴的羁縻统治^[1]；一说楚通过封楚族人于巴地来控制巴国部族^[2]；一说楚将占领的巴地分别划归巫郡、黔中郡管辖^[3]。应该说上述几种观点皆有所据，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不管楚对巴地占领区采取了何种管理方式，楚在巴地应该有行政管理和政区的划分，这种行政管理和政区划分，对后来秦巴郡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区划设置应该有直接影响。

秦灭巴后在原巴国之地设置巴郡。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载“周赧王元年……置巴郡”^[4]，周赧王元年即公元前314年，说明秦巴郡的设置是在公元前314年。公元前314年设置的巴郡包括哪些地域呢？这还要从秦灭巴国之前，巴国的疆域说起。根据史书记载，秦灭巴是在周慎王五年，即公元前316年，当时“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5]，那么公元前316年前巴国的疆域包括哪些地方呢？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当时楚所占据的巴地的范围。

楚对巴地的占领经历了一个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过程。在战国末期，“巴楚数相攻伐”^[6]，在巴、楚的争战中，巴国势弱，楚国不断西进，致使巴国的很多土地沦为楚国的疆域。至秦孝公元年（前361），已是“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7]，这里的“巴”、“黔中”，实际上就是公元前361年前后楚在巴地的占领区。“黔中”即后来秦所建立的黔中郡之地，其地域大致在长江三峡以南的地区，大致包括今鄂西南、渝东南、湘西北和黔东北的部分地区；而此时的“巴”，大致包括江州（治今重庆市渝中区）以东的区域，《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扞关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东，阳关在今重庆市长寿区东南黄草峡北，从关隘的位置来看，阳关很可能是当时巴国为了抵御楚国西进设置的最后一道关隘。后来伴随着楚人的继续西进，遂而占据江州，巴国王族被迫北迁阆中，因此就有了巴子“后治阆中”的记载^[8]，这个“后”字，也说明了巴国都城最后其实是在阆中。迁都阆中之于巴王来说，其实是无奈之举，目的是为了躲避楚国的攻击。巴王迁都阆中之后，楚对巴的征战并没有停止，到楚威王之时（前339—

[1] 高至喜：《楚人在湖南的活动遗迹概述》，《文物》1980年第10期；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1页；何浩：《周初的监国制与战国时的楚监巴》，《历史知识》1989年第6期。

[2] 周集云：《巴族史探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22—125页。

[3] 刘蓬春：《战国秦蜀楚巴对汉中、黔中的争夺》，《成都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赵炳清：《略论峡江地区盐卤资源与楚西进置郡的关系》，《三峡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4]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5]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6]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7] 《史记》卷五《秦本纪》。

[8]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